

完善全球数据治理 让数据红利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谭铁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加速迈入智能时代，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日渐显现。”作为智能时代的“新石油”，数据日益成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和重要战略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重塑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农村、安全、文明与治理。与之相较，数据治理体系的调整速度明显滞后于数字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全球数据治理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制约了数据价值的充分释放。为此，要完善全球数据治理，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开放、安全、包容的全球数据治理体系，让数据红利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深刻认识完善全球数据治理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数据治理是有效应对数字时代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推动数据真正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的，从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更好发挥数据的赋能发展、价值倍增作用。

弥合数据鸿沟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弥合南北发展鸿沟，更好维护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当今时代，促进和保护“数字发展权”，反对“数字排斥”已成为各国的核心关切，广大发展中国家期盼享有平等的数据获取权、公平的数据利用权。完善全球数据治理，有助于打破国际社会既有的数据藩篱，推动数据资源、技术能力和发展机会在更大范围开放共享，缩小南北数字差距，摒弃“小院高墙”，防范数据霸权、“数据殖民主义”，推动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升数据利用能力、共享数字发展成果。

释放数据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谁能把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完善全球数据治理，建立健全涵盖数据共享交换、安全认证、合规评估等全生命周期的制度体系，有助于激活全球用数活力，为各国政府与企业深化跨国、跨领域数据合作与业务协同营造可信生态，从而进一步优化全球数据资源配置，破除数据跨境流动壁垒，加速数据驱动的融合创新，最大限度地挖掘数据潜能、创造数据价值。

繁荣数字经济的关键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完善全球数据治理，以数据流汇聚技术流、人才流、资金流，实现知识全球扩

散，有助于重塑价值链布局，推动全球经济向智能化、一体化跃升。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的创新迭代，“以模引数”“用数赋模”的良性循环与双向赋能，既带动了商业模式与产业业态的优化，也促使全球在数字化供给与需求的新锚点形成再平衡，为各国生产力变革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确保数据安全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规范数据资源利用，防范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随着应用场景的持续拓展，数据在跨境传输、存储和应用等环节发生泄露、滥用、篡改、伪造等的安全风险日益加剧。完善全球数据治理，有助于凝聚全球数据安全共识，推动各国加强技术合作与经验共享，提升跨国数据安全风险的协同应对能力，促进全球数据资源在安全、合规、可信的前提下实现开放合作共享。

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全球数据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全球数据治理，有助于深入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数字空间延伸，有效填补数字领域治理空白，解决数据治理失范、数字鸿沟等全球治理突出问题，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丰富全球治理内涵、提升协同治理效能，消除全球治理赤字，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准确把握全球数据治理面临的多重挑战

数据的爆炸式增长既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当今世界，全球数据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十分突出，数据治理规则碎片化、南北数字鸿沟持续拉大、数据流动不畅、安全风险频发等现实挑战交织，给国际社会带来诸多风险隐患。

合作交流不充分，全球治理共识缺失。数据治理关乎国家主权、科技创新、市场竞争等，各国在数据的开放流动、主权控制、风险规制之间持续博弈。例如，美国以“数字自由”为名试图维持数字霸权地位，欧盟通过严格数据立法放大“布鲁塞尔效应”，差异化的治理取向催生了不同的合作圈层，全球数据治理格局的分化与失衡进一步加剧。

规则体系不兼容，数据合规成本高企。随着全球数据制度博弈持续加剧，数据规则碎片化加深，多边协调机制缺位，合规壁垒问题突出。当下，单边主义思维与“数据殖民主义”不断强化规则外溢与制度对抗，各国普遍借助单边立法、区域协定和数字同盟等方式维护自身规则、力求主导优势。在多元规则并行之下，企业进入不同市场时需要应对多套合规要求，重复部署数据存储、跨境传输、内部共享、外部披露和审查响应等合规安排，跨境经营成本与合规

摩擦风险攀升。

资源配置不均衡，南北发展失衡加剧。全球数据资源与价值收益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头部企业，发展中国家在能力建设和价值分配中的弱势地位被进一步固化。以美国为代表的“数字北方”及少数跨国企业凭借技术、资本和平台优势，垄断数据采集、算法训练、平台分发和价值变现等核心链条，集聚全球数据资源，获取高附加值收益，并牢牢掌控数据规则制定权。相比之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受制于基础设施、资金技术和人才储备等短板，长期停留在原始数据供给和低附加值环节，只能被动适应外部规则，南北发展失衡持续加剧。

流动共享不便捷，数据价值释放有限。全球数据资源的高效汇聚、流通和协同利用面临多重障碍，数据价值释放受到明显制约。当前，数据跨境流动的互操作性显著不足，现有标准和技术规范难以自然形成稳定衔接，加之本地监管、平台封闭和商业锁定等多重因素影响，数据标准采用、制度安排与协同实施之间存在明显脱节，无法在不同国家、平台和场景之间实现顺畅汇聚、共享调用和持续开发，数据的规模效应、协同效应与增值效应未能得到充分释放。

治理机制不匹配，数据安全风险凸显。随着数据流动加快、平台深度介入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部署，数据安全风险形态持续变化，呈现跨境扩散和叠加外溢的显著特征。算法偏差、深度伪造、模型滥用、数据污染、数据投毒等新型风险不再局限于单一环节和主体，正沿着数据、模型、服务、平台和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快速传导，致使责任边界、损害认定和处置链条更加复杂。现有治理机制主要建立在传统数据保护和本地监管基础上，在跨境风险识别、责任划分、协同处置、证据追溯和权益救济等方面存在明显滞后，难以有效防控和应对新型数据安全风险。

牢固树立全球数据治理的正确理念，推动全球数据治理向善向好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支持世界数据组织发挥作用，同各方一道凝聚数据治理规则共识，推动数智技术创新，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和高效开发利用，服务全球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让数据红利更好造福各国人民。”面对数字化浪潮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要以开放包容、胸怀天下的全球视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义融入全球数据治理的基本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开放协同、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安全为基，树立全球数据秩序的价值遵循，夯实全球数据生态的制度保障，促进全球数据红利充分释放，守牢全球数据赋能的向善底线，为一步完善全球数据治理格局锚定正确航向，推动全球数据治理向善向好发展。

以精准思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熊学艺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促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作出专章部署。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既要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也要坚持和运用精准思维，因地制宜推动相关政策精准落地，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精准思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的科学思想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成败之举在于精准”；乡村振兴“要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因村制宜、精准施策，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保障和改善民生“要针对特困人员的特点和需求精准施策，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救助金，强化临时救助，确保兜底兜牢、兜准兜好”；等等。这些都是坚持和弘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生动体现。

我国农业农村地域差异大、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精准思维是做好强农惠农富农工作的重要思想方法。立足各地实际，抓住主要矛盾、关键领域和重点群体，把精准思维贯穿政策制定、资源配置、执行落实、效果评估全链条，才能不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为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以“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治理智慧，推动实现政策举措精准对接、资源投放精准高效、政策红利精准传导，让强农更有支撑、惠农更有温度、富农更有实效。

以精准谋策夯实基础。提高政策效能，首先需要从源头谋划分类科学、靶向清晰、相互贯通的政策体系。这将为精准发力筑牢政策根基。要坚持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根据粮食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等不同功能定位，实行差异化政策供给，不搞“上下一般粗”。比如，聚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推动政策资源重点向“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领域集中，有助于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粮食主产区抓粮有积极

性；对农村低收入人口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有利于实现精准滴灌、有效帮扶，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同时，要强化政策系统集成，打破区域分割和部门壁垒，统筹推进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土地政策、人才政策等同向发力，形成上下衔接、左右协同、精准高效的政策格局。

以精准执行促落地。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提高政策效能必须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让好政策直接见效于农业、服务于农村、造福于农民。要简化政策实施流程。比如，推行相关补助资金的申报、审核、公示、拨付全流程线上办理，减少中间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可以实现政策资金直达快享、精准到户。又如，加强数字技术运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精准识别政策对象、精准匹配支持项目、精准监测实施进度，推动从“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能够让农民群众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看得懂、用得上的、真受益。此外，要加强乡村振

广泛凝聚全球数据治理共识。凝聚治理共识是深化全球数据合作的首要前提。要增强以人为本、开放协同、普惠包容、安全向善的治理共识，充分发挥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作用，寻求全球数据治理的最大公约数。通过发布联合声明、行动计划、合作倡议等方式，持续强化数据治理共识，加快构建各国共谋数据话语体系、共筑数据信任生态、共享数据开发红利的全球数据治理新秩序。

构建数据治理高效协商机制。高效协商是构建新型数据关系的关键支点。要立足数据要素流动关联、相互依存的客观现实，尊重各国数据治理传统与自主发展道路，持续拓展全球数据合作伙伴关系网络，扩大数据共享共赢“朋友圈”。坚决摒弃“本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思维，反对数据封闭和排他性联盟，提升全球数据治理话语表达的代表性与包容性，加快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多边对话协商机制。

塑造数据要素流通良好生态。数据要素的高效流通是数据赋能发展、激活价值创造的动力源泉。要增强数据治理的战略主动，强化大国责任担当，坚持务实行动导向，优化全球合作布局，聚焦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数智技术创新、高价值数据产品开发等重大议题，深入开展全球多层次数据合作，着力补齐发展中国家数据能力短板，合力塑造开放、包容、安全、合作、非歧视的数据流通生态。

筑牢跨境数据安全保障体系。维护安全稳定是全球数据治理的底线要求。要顺应人工智能演进、数据跨境流动深化和全球供应链重组等发展新态势，推动数据安全治理实现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塑造、从单一监管向协同共治、从静态防护向动态保障的转变。凝聚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合力，统筹隐私保护、安全技术、风险预警、安全审查、快速响应等环节，健全跨境数据合作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全球数据安全底座。

推进全球数据人才协同培养。培养创新人才是提升全球数据治理能力的一项基础工程。要紧扣数据合规、数据安全、数据开发利用等能力需求，统筹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国际组织和行业平台资源，完善产学研用协同培养机制，构建课程共建、联合研究、专题培训、项目实训相衔接的国际协同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兼具技术应用、治理水平、法律素养和国际合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筑牢全球数据治理的人才基础。

充分发挥世界数据组织平台作用。世界数据组织是推动全球数据治理机制化、常态化的国际组织和重要平台。要建立常态化议题设置和专题研讨机制，广泛汇聚各方关切，形成规则协调、标准协同、研发协作和能力协进等工作机制，推动将阶段性合作转化为更具连续性和执行力的国际合作安排，切实把平台优势转化为议题组织、规则协调、项目承接和公共服务能力，加快构建开放协同、互利共赢的全球数据合作新格局。

(作者为南京大学党委书记、世界数据组织理事长)

兴资金链条监管，提高涉农资金使用效益，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见到真成效。

以精准赋能强动力。运用精准思维提高政策效能，最终要落脚到通过精准赋能，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增强发展可持续性，实现精准赋能、久久为功。要结合实际精准培育乡村产业，支持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业态，发展联农带农富农产业，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节约集约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加强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依法盘活用好闲置土地和房屋，吸引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有序入乡，不断增强乡村发展活力。聚焦农村教育、医疗、养老、人居环境等农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始终坚持农民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完善农民参与机制，激发农民参与意愿，强化农民参与保障，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作者单位：北京农学院)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对世界体系的深入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一道，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深化全球南方研究，是一个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鲜明现实意义的理论命题，也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体系的分析范式，对深化全球南方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从思想史的脉络追溯，对全球南方的研究呈现出两条主要路径。第一条路径来自国际政治研究传统，研究者提炼出自殖民、反压迫、求发展的基本主题并将其理论化。第二条路径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主要将全球南方置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演进的历史进程中，从世界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国际权力关系等更加宏阔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事实上，到今天，全球南方之所以成为一个具有解释力、影响力的概念，正在于它触及了一个关于世界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和国际权力关系的重大问题域。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体系的分析范式，对今天深化全球南方研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继承历史上经济学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成果，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展开的理论构想，尤其是“六册计划”中关于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主题安排表明，对于资本主义不能仅从单一民族经济体系来理解，必须从世界体系的整体运动来把握。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是孤立的、碎片化的，而是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性根植于资本的全球扩张本性，根植于国际分工，也根植于价值创造与分配的全球化结构。理解和把握世界发展和格局演变，应从资本运动、价值增殖、分工体系扩展以及技术进步等维度展开，不能简单地就国别谈国别、就经济谈经济、就政治谈政治。

这也启示我们，对于全球南方，需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深化研究。从这一视角把握全球南方，研究全球南方，不能将其狭义理解为政治、财政、金融或一般事务，而应从更宏观的世界经济结构、资本运动、价值分配以及制度演变角度进行分析。

中国的发展壮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深化全球南方研究带来新的启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发展中国家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支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愿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实现现代化。”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从相对落后的起点出发，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功打造并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既在实践上推动全球南方不断壮大，成为维护国际和平、带动世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关键力量；也在理论上围绕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治理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重要论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深化全球南方研究带来新的启迪。

比如，新时代以来，我国在发展中形成了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也为观察研究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又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14亿多人口的大国发展壮大，没有复制传统大国争霸扩张的老路，而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推动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给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论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全球南方并不是简单研究“他者”，而是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中国自身，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理解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实现发展、重塑规则并提供新的公共产品。这不仅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创新命题，也对相关领域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南方在世界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当前，全球南方在人类进步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中逐梦现代化，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过去，全球南方的诉求主要围绕独立、发展、反殖民、反压迫而展开，强调在国际政治中的集体发声与相互声援。今天，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其内涵、地位和运行逻辑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在合作内容方面，南南合作正在从政治声援转向务实合作，更加注重推动能力建设、发展合作、产业协同、金融联通等。二是在合作方式方面，随着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遭受严重冲击，区域主义与跨区域合作不断强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正在形成新的合作网络、制度安排与治理平台。三是在全球治理方面，全球南方正从争取道义公平转向更注重共同塑造规则、提供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过程，由单纯的集体性发声转向更具组织能力和引领能力的发展格局。特别是随着中国发展壮大，全球南方在世界贸易、投资、产业链和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不再只是旧体系中的边缘地带，而正在成为重塑世界体系的重要力量。

全球南方内涵、地位和运行逻辑的变化，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与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潮流中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南北关系出现历史性变化密切相关。这一变化的根源在于资本流动、经济发展和技术革命的深层推动。同时需要认识到，当前世界和平和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南方振兴之路注定不会平坦。正因如此，对全球南方的分析研究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这既是理论逻辑所要求的，也是现实格局变化所推动的。

总的来看，理解把握世界格局发展走向，深化全球南方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深入认识南北关系、发展方式和全球治理。从学理上看，这是深深嵌入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分析传统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只有从国际分工、资本运动、价值形成与分配、制度结构和技术变迁等维度出发，才能真正把握其内涵。从现实上看，全球南方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世界体系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演进过程中。对全球南方的研究已不是对现有区域国别研究框架的简单补充，而应成为连接战略判断、理论创新、学科建设与科学实践的重要支点。它既回应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要求，也为理解未来世界经济与世界秩序演变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化全球南方研究

刘元春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